治学方法

方东美的“哲学五喻”

□郭继民

在现在新儒家中，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可谓别具一格：他不但学贯中西，而且融思辨与诗情于一炉，汇文化与哲学于一体，堪称一代“诗哲”。由于方先生涉猎广博，加之他天马行空的思绪与富于文学才情的笔法，常常使得初学者难入其门。方先生的弟子傅佩荣先生曾言：“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十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你隔了一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三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因为人类探求智慧的心路历程与心得结晶，经由对照比较之后，就像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将散发既独特又一致的光彩。”确实，若读方先生《华严宗哲学》《新儒家十八讲》等晚年“著作”，当知此言不虚——因上述著作为方先生晚年的著作乃是其弟子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由此可知，要系统掌握方东美的哲学思想非得有相当的学识不可。

不过，由于方东美先生极富诗人的才情与睿智，譬如，他极善于比喻，通过他的几个比喻，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其学术之大端的。

“坐飞机”

方东美先生经常跟学生讲，学哲学要坐飞机。“飞机在云层里。霞光灿烂，紫霭缤纷。凌空俯视地方上，所谓万类群品，游目骋怀，不觉忘怀得失。”其理由在于，平常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平面的看法，对人世间缺乏充分的了解，往往因痛苦的经验去诅咒世界，认定其荒谬。学习哲学的人如果只认识此世界之丑陋、荒谬、罪恶、黑暗，就根本没有智慧可言，而坐过飞机则不同。这里的“坐飞机”比喻人的智慧、德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用方先生自己的话讲，就是“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最高的阶段同宇宙的最高精神化为一体，就是般若与菩提相应”。当人类的智慧到达这样的高度后，他的精神之光、道德之光、智慧之光就会把一切丑陋的缺陷的局部表象化除掉了，并用诗人、艺术家的奇情幻想的审美眼光去审视下层世界时，一切“都变做洽然俱化于妙道周延的天地大美中的人间天国”。

很明显，方先生“坐飞机”的比喻，来源于华严宗。小乘佛教对世界充满了诅咒和厌弃，而华严宗则相反。华严宗认为，人类的智慧与精神是不断提升的，当达到最高智慧即征得菩提时，他不但不厌弃世界，反而对世界充满了赞誉，对神性的光普照世界，此即《华严经》所谓的“下回向”。“坐飞机”的比喻生动地表达了方东美对人类精神不断提升的肯定，并构成其生命本体论的重要一环，即人格超升论。

“放风筝”

“放风筝”也是方东美常用的比喻之一，他认为“任何人要从事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除了坐飞机外，在这世界上要平平实实地像小孩放风筝”。那么“放风筝”的寓意何在呢？方东美认为，“小孩子”虽然在地面，不能升入太空去亲自目睹宇宙神奇的创造力量，然而，“风筝线”却始终掌握在小孩子手中，此即“揽彼造化力，持我为神通”。“风筝线”在方东美看来，乃是“发现中国民族集体智慧的线索”，它即表现为“建大中以承天心”的中庸之道或中道精神，又表现为庄子的“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高妙智慧，同时还表现为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高度艺术精神。如果说，“坐飞机”是作为“人格超升”之果的比喻，那么“放风筝”则是达成“坐飞机”的途径，大智慧必须有好的工具，中国哲学中的那根飘忽不定的“风筝线”无疑值得探究。事实上，为了研究这根神奇的风筝线，方先生自中年便由“西学”转为“中学”，晚年更是如此，其《中国大乘佛学》《原始儒家道家》《华严宗哲学》等等皆是暮年之作。同时，“风筝线”除了代表中国哲学的高妙智慧外，笔者以为还可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探讨之。方先生认为西方哲学是两橛的世界，自柏拉图所开创的西方哲学精神传统——将世界分为形上与形下世界——以来，人间与天堂、灵与肉、内在与超越、本体与现象等皆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无法打通。而中国哲学则不然，乃属于内在超越，既内在又超越，人们既为俗世之人，又能通过肉体生命的逐步提升渐次为心理生命、心灵生命、精神生命、价值生命乃至达到超越的真人、圣人、佛，而“风筝线”（中国哲学的体用不二、天人不二的观念）就是联系内在与超越的“红线”。

“看大海”

（心量要大）在《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方东美先生认为，学哲学除了坐飞机外，还应观海。因为海的容量大，所映现的天光云影，美景无限。他认为，要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成为一名卓越的学者，一方面要具有坐飞机（如庄子大鹏鸟高空俯视）的智慧，另一方面还有大海潮音之美。“能与海天融成一片金色的光芒，意识并现出无与伦比的美景……想要不做个诗人也不可能。大诗人的智慧可变为大哲学家的智慧。可是从历史上看来，学术的涵量都不免太小了。上不见寥落长天，下不见浩渺大海。只是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扁平的生命，甚至画地为牢。这样怎能再产生创造学说？”方东美的“大海潮音”，有两层含义：一则是学者要有大海海纳百川、兼蓄并包的胸怀和雅量；另一则是学者要有大诗人的浪漫想象力和创造能力。方东美的“海潮音”之喻可谓夫子自道，他本人学贯中西，精通儒、释、道，兼容并包，真真有禅宗“一口吸尽西江水”的气概；而且方先生极富诗情，且哲思与诗思融为一体，极富创造力，在现代新儒家中别具一格，不但是一代大哲，更是一代诗哲。

“四种人”

如果说上述三喻倾向于中西哲学比较的立场立论，那么方先生的“四种人”比喻则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出发，精当地概括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佛家及新儒家（宋明儒）的哲学特质。方东美认为，原始儒家为时空人，原始道家为太空人，佛家为“兼综时空而迭遣”，新儒家为“时空兼综人”。具体说来：原始儒家崇尚中庸（和）和“时”的精神，把宇宙的真相、人生的真相皆置于时间的流变之下，进而在时间中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为典型“时际人”；原始道家崇尚虚、无，颇具典型的天马行空的艺术精神，他们让精神超升到宇宙最高境界，然后从太空（太空即为道家理想的空间世界）观照世界，属于典型的“太空人”；佛家之小乘执着于“空”而排斥生命世界，是为遣空，大乘则在参透了人生的苦衷后重新以大慈、大悲与大智重返世间（时间与空间），是为兼综时空——若将大小乘综合起来，即为“兼综时空而迭遣”；新儒家吸纳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及大乘佛学之精华，“或自时间，或自永恒而观照之，显为不同程度精神之灵昭”，故称之为“时空兼综人”。“四种人”喻，生动形象且准确地把握住各家哲学的特点，这种举重若轻概括方式，断然非功力深厚者不能为之。同时“四种人”喻，也是方先生论“殊异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方先生对中国哲学所涉及的原始道家、原始儒家、原始佛家和宋明新儒家的高度赅摄和概括。

“点蜡烛”

方先生在讲学五十周年的退休庆祝茶会上，因方先生将手持的蜡烛，分传与会的中外各国同学，随即以“烛光”畅明华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互摄之妙理。“……现在大家点了这个灯（蜡烛），你照我，我照你，你又照他，他又照他……这样一来，产生了一个光明，在那个地方彼此辗转增加它的功用，提高光明的普遍性、永恒性、悠久性、无穷性。” “点蜡烛”或曰“烛光喻”的原型出自《华严经》，善财童子经过“五十三参”后来到弥勒佛的大殿，看到大殿里的诸多宝珠彼此涵摄、映照，在彼此的涵摄过程中，善财童子的形象由一个而变成无数个，并借此进入庄严的神奇世界。也许，告别会上，方东美先生烛光喻的本义在于激励其弟子的希望，让每个弟子都怀有希望的光明。不过，方先生的“烛光喻”同样显明了其“有机哲学”的特质，方先生的哲学本体论乃是“有机生命本体论”，在方先生看来，宇宙并不只是一个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现象里面都蕴藏着生意，此即为“万物有生论”。当然，方先生的哲学资源除了“四大家”（原始儒、释、道及新儒家）外，还融汇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格森、怀特海的有机哲学。若从方先生的整个哲学来源来看，“烛光喻”同时还意味着方先生对各种智慧之光的高度融摄。

要之，通过以上五个比喻，我们大致理解方东美“万物有生论”之哲学的主旨，概略地认识到其“旁通统贯论”“殊异道论”及“人格超生论”之要义，也大致获悉方先生的治学路径和特色。当然，要真正理解方东美的哲学，则非读方先生的著作不可。

书 摘

开卷有益与开卷有疑

□杨奎松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可惜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是，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然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地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了。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

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及其家庭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人每个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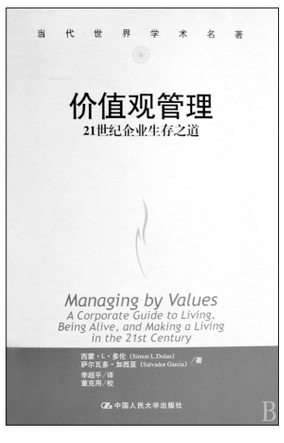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断乎不能成立。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上个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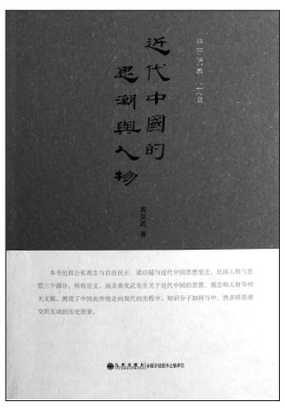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话都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掣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癚”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摘自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好书推荐







书名：《价值观管理——21世纪企业生存之道》

作者：西蒙·L·多伦 萨尔瓦多·加西亚/著 李超平/译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译者谈书：价值观是超越具体情境，引导个体对行为与事件进行选择与评价，指向希望达到的状态与行为的一些重要性程度不同的观念与信仰。价值观能帮助我们认识事情的意义与价值，指引我们努力的方向，并最终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很容易认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是难以对价值观进行管理。本书详尽地介绍了价值观管理的理论、价值观管理的实施过程，可以帮助读者对价值观管理有一个清楚、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并且教会读者一步步实施价值观管理。

书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

作者：韩震

出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

编者谈书：本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通俗而简明地讲解和回答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什么是核心价值观，它与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凝“神”聚“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如何强“魄”健“体”，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等。同时，尝试性地提出“民主、公正、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语言简明，说理透彻，图文并茂，形式活泼，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通俗理论读物。

书名：《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作者：黄克武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3年3月

编者谈书：本书内容包括公私观念与自由民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民国人物与思想三个部分，涉及关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人物等内容，展现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知识分子如何与中西多样思潮交织互动的历史图景。本书作者对于史料运用及文本分析颇为细致，并得出了许多较为新颖的结论。

读点“不喜欢”的书

□胡昌方

读书，当然要读自己“喜欢”的书。阅读自己“不喜欢的书”，岂有此理？又有何必要？有的。比如，有的人喜欢读一些消遣性的书而不大喜欢读知识性的书，结果书读的不少，却收获甚微，“满锅稀粥没个豆”，知识水平没有多大长进。因此，从扩大知识面、增长知识水平来说，读点自己“不喜欢”的书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有益的。

毋庸讳言，读书是要有兴趣的。《礼记·学记》中有言：“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其意就是说对某一门技艺，如若不感兴趣，就不可能乐而学之，学也难以达到目的。所以，古往今来，大凡学有建树者，无不对自己的术业知识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

然而，兴趣固然重要，却只能是走向成功的条件之一。著名作家张立宪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书，但千万不要局限于此。”如果“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往往就会被兴趣“牵着鼻子走”。倘若只读自己“喜欢”的书，而冷落自己“不喜欢”的书，抑或只偏爱没有多大价值的书而忽视很有价值的书，结果，势必会养成“食欲单一”的偏食症，酿成“营养不良”的贫血症。可见，要医治好这种“偏食症”和“贫血症”，就得读点自己“不喜欢”的书。

当然，要真正能读点并读好自己“不喜欢”的书，是需要决心和毅力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非啃不可的书要硬看”，要用一股子“咬劲”强逼自己去看。

我的一位战友是个“文革”中“挂名”的初中生，知识浅薄。平素，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古今中外的言情小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身边有好几个炮兵战友在认真自学和炮兵专业训练相联系的“网络法”。于是，他硬着头皮也加入了这一学习与深造的行列。枯燥无味的网络法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于是，他从自己“底子薄”的实际出发，利用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刻苦攻读了以前从不喜欢读的高等数学、运筹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他脱颖而出，竟然得心应手地写出了《网络法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初稿。经过五易其稿，终于成就了20余万字的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基层广大官兵和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

其实，纵观古今，不少名家学者学有建树，往往是从攻读自己开始并“不喜欢的书”起步的。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兴趣是可以培养、可以扩大的，同时也是可以转移的。只要对自己“不喜欢”而真正管用的书，铆着劲儿读下去，那么“不喜欢”的书也终会变成为自己“喜欢”的书，而且定会学识卓著，大有作为。

读书方法

出版动态

多种语言传播中国梦

本报讯（记者 王翠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理论热潮，国际社会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何向国际社会阐释这一理念，以使其系统了解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内涵和意义，直接影响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传播。

近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多语种外语翻译出版座谈会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中央文献翻译’研讨会”在中央编译局召开。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晖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编译局局长贾高建致辞。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柴方国、秘书长杨金海分别主持会议。来自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有关单位领导与长期从事翻译和对外传播研究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参加座谈和研讨。

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多语种翻译出版，以及中央文献翻译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作了讲话和发言。

与会专家指出，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世界主要国家普遍把加强对外传播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与会专家指出，做好党的文献对外翻译和传播工作，要有新举措。一是要继续对外阐释好、解读好中国梦，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和阐释工作。创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积极拓展国际交流平台，最大限度地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梦，认同中国梦，共享中国梦。二是要把宣传阐释中国梦与宣传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结合起来。抓住有利时机，重点抓好讲话重要概念、基本思想、特色表述的对外翻译和传播，介绍好、阐释好新一届党中央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决策部署，为我国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三是要大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打造融通中外的国际话语，要善于从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中总结提炼鲜活话语，总结形成准确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对外表达方式，既要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气派，又要把握国外受众思维习惯，运用国际能够广泛接受的表达方式，使我们的对外话语易于接受和传播。